

理事長演講

社會資本與信任： 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反思

熊瑞梅

熊瑞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通訊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大社會系，E-mail: hsung@nccu.edu.tw。感謝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及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六期三次的題組研擬小組成員，特別感謝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主持人章英華教授的邀請，及研究助理政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夏中蘭協助資料整理與分析工作。

中文摘要

民主化過程中的民衆社團參與、信任規範和政府效能之間的因果關係，始終都是西方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懷的議題，但社會學家應該探索出更適合解釋民主化過程中的東亞市民社會的路徑。2012年的東亞社會資本調查中提供了臺灣、日本、南韓及中國民衆的個人接觸網絡、社團參與、政府效能及社會信任等資料。在和其他東亞三地資料比較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臺灣民衆在公民社會參與、政府效能及社會信任上獨特的現象。臺灣社會民衆社團參與的比例特別低，但日常生活每天接觸的社會資源量多，且異質性的個人社會資本特別豐富；民衆對政府特別地覺得無力影響政府的作為，故對政治極度地沒興趣，也對政府各類制度代理人信任度特別低；但卻對社會與鄰里有高度的關懷且願意為社會付出。從這次東亞社會資本的調查比較描述性分析所勾勒出來的圖像來看，臺灣和日本是公民社會組織層級化的軸線的兩個對立的端點，臺灣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人際信任、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都沒有任何作用，但臺灣民衆的個人接觸網絡的社會資本對於人際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形成產生影響力。反觀日本民衆高度的社團參與（四國最高，八成以上民衆）所生產的組織社會資本是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基礎。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提供了東亞社會學家發展一條對東亞公民社會建構的一條可能的理論解釋機制。

關鍵詞：組織社會資本、個人社會資本、信任、東亞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and Trust:
Reflections on Data from the East Asia Social Capital Survey**

Ray-may HSUNG

Abstract

Western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sociologists have shown strong interest in causal relations among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rust norms,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few have explored appropriate explanatory paths among these concepts in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civil society. In this paper I use data from the 2012 Social Capital Survey in East Asia on accessed network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social trust. A surprising and unique phenomenon in relations among civic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social trust was observed for Taiwan compared to the other three countries (Japan, Korea and China).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was very low, but the volume and variety of social resources embedded in accessed networks were exceptionally high. Apparently, the majority of the voting public feels incapable of influenc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y have very low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very high distrust of government agencies. However, they do show concern about neighborhood issues and claim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to their society. Results from comparative and descriptive analyses of the survey indicate that Taiwan and Japan are at two opposite ends of the spectrum in terms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 civic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tied

to participating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pparently does not affect personal, institutional, or general trust, yet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 in accessed social networks affects both personal and general trust. In contrast,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participant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ong the four countries in the survey was in Japan (>80%), creating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serving as the basis of institutional and general trust.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Trust, Social Capital Survey in East Asia

一、緣起

有人是窮的僅剩下金錢，而我要說臺灣社會窮的僅剩下社會資本。從2000年以來，全球化在東亞四地的經濟和學術交流更加的頻繁，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也分別於2001年加入國際社會調查；也於2003年起參與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 Social Survey），成員包括臺灣、韓國、日本與中國等四個國家。2008年本人受邀參與東亞社會調查社會資本與信任的計畫，沒想到在分析2012年的正式調查資料後，透過國家資料的比較，很驚訝地發現臺灣社會民衆持續低迷的社團參與現象，對政府相關代理人又高度的不信任，及對政府效能充滿強烈的失望與無力感。故，深感透過東亞國家的社會調查比較，才看出了這個臺灣公民社會發展的獨特性。¹

臺灣民衆在解嚴後便出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Marsh 2003；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2010），但社會學家沒有特別關懷這種現象的前因後果。Marsh（2003）可算是很早就發現這個社團參與下降和民主化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他使用臺灣社會變遷調查1992和1997年的社團參與資料，並指出臺灣社會民主化的政治環境，應該會促使更多人參與社團；然而，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和1996年的總統直選，都未促使民衆社團參與的成長，這種違反Tocqueville（1961）和Putnam（1993, 1995）所強調的社團參與的社會資本對於維繫民主功能的正面效應的主張，是直接

¹ 這是2013年11月29日臺灣社會學會年會理事長演講稿，當初是在進行東亞社會資本調查資料，看到臺灣民衆對社團參與的疏離，及對政府效能的失望和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感到震驚，故特別從這個調查的比較描述性的分析中，凸顯臺灣民衆個人社會資本和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與社會信任之間可能有的謎題，作簡單介紹和進行反省。

挑戰了Putnam（2000）的理論。熊瑞梅等人（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2010）將1990年以後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八期的資料合併，發現臺灣民衆在解嚴後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及分析世代和時期效果。熊瑞梅等人發現大專以上的民衆社團參與下降趨勢最顯著，且情感維繫功能的地方性和宗教性社團維持穩定發展趨勢，但利益性工具性和跨地方性的社團參與下降趨勢也較顯著。顯然，臺灣政治解嚴民主化的公民社會參與實質的意涵，仍然存在許多謎題。

有關社團參與和民主化的議題，東亞和臺灣的政治學家都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術研究成果。一些從社會資本理論來討論社團參與意涵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Putnam 1993, 2000; Paxton 1999），都認為一個社會民衆積極參與社團，是有助於有組織的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比較能有效率地由這些公民組織來監控政府政策和效率。臺灣在解嚴後，社團參與的不積極，是否會影響後續社團組織對政府政策監控能力不足，進而政府政治效能不彰，民衆更加不信任政府，故使得以參與社團組織來壯大公民社會的發展軌跡似乎受阻。但Marsh（2003）認為強調社團參與所創造的社會資本有助於民主政府的效率的論點，是比較適合西方社會資本與民主化的理論機制；他建議從事臺灣的公民社會與民主化的研究，應嘗試以人際網絡的個人關係社會資本來探討。許多從事東亞民主化研究的政治學者（Ikeda 2013）都主張東亞民主化的發展和市民社會之間的關連呈現多元文化模式。Marsh（2003）主張研究臺灣的公民社會不要忽略了地方政治文化中的關係、人情、面子等個人投資的關係網絡的社會資本效應。

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存在臺灣工業化過程中，以擬似家族連帶由內往外推的遠近親疏信任關係所發展的經濟組織模式。臺灣在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其獨特的中小企業的協力生產網絡模式。1980和1990年的

社會變遷調查中，受訪者是小頭家身分者往往超過30%。同樣地，在民主化發展過程中的市民組織參與模式，明顯沒有成長擴張，是否臺灣民眾在關懷社區或公共事務上就如中小企業的協力網一樣，仍然依賴以個人往外觸及的社會網絡資本作為從人際信任到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的機制；而不是朝向西方以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進行制度化的民主參與及監督政府的公民參與活動。

不論是過去臺灣中小企業，或是臺灣社區鄰里的公共參與的經驗，信任在社會變遷中的現代化、工業化和民主化的過程中，都是扮演社會連帶重要的黏著劑（Luhmann 2000）。從早期臺灣中小企業的協力網的差序信任（陳介玄 1994），到全球商品鏈在臺灣的層層外包的廠商間的信任關係（潘美玲、張維安 2001），在在都和臺灣彈性多元異質的日常生活社會網絡是有關的。2012年的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第一次有機會針對南韓、日本、臺灣、中國大陸四個社會進行個人日常生活接觸的網絡，民眾社團參與的狀況，及民眾從人際信任到制度信任的差序信任資料。故希望能從初步的簡單整體資料模式的比較描述中，讓我們看出臺灣獨特的個人和組織的社會資本與差序信任的模式，並企圖反思東亞四地的個人網絡資本和參與社團的組織社會資本對不同類型的信任造成的影響，是否可以朝向建立東亞社會理論解釋架構的可能性。

二、臺灣參與社團的社會力相對弱

透過跨國比較的民眾社團參與和民眾對政府和社區的看法調查資料，也能呈現臺灣社會力的獨特輪廓。社團參與經常被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視為民眾參與公共組織，在社團的脈絡下，民眾可與不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族群等社會特質的人接觸，進而會形成較多弱聯繫的社會

資本，也比較能更理解不同社會圈的人的想法，進而對一般大眾比較容易產生信任。首先我希望能從表1和表2來呈現臺灣民衆的社會力和其他東亞三地的差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南韓及臺灣的經濟政治發展經驗比較類似，故Hamilton and Biggart（1988）主張這三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發展經驗是可以進行歷史比較分析。顯然，日本和南韓在公民組織的發展相對成功，但臺灣公民組織的發展顯得相當脆弱。從表1呈現的民衆有參與至少一個以上社團比例，臺灣相對於日本和南韓，是比例最低的社會。臺灣民衆參與一個以上社團的比例僅有36.65%，日本最高達82.85%，南韓則略低於日本，也高達76.07%；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是國家壓制公民結社的權力，故民衆參與一個以上社團的比例僅有22.49%

四個不同社會的民衆參與不同社團的比例也不同，在臺灣民衆參與宗教團體的比例最高，高達12.10%；臺灣的宗教團體參與，一直都是穩定社會凝聚力的重要社會力，熊瑞梅等人（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2010）發現，臺灣民衆參與社團下降趨勢中，民衆參與宗教社團組織的比例保持持平或上升。在中國，民衆參與工會團體的比例最高，高達8.75%，這些工會應該都是由國家主導，便於控制勞動次序，缺乏自主性的社團。日本民衆參與社區（村里）管理委員會的比例最高，高達60.72%；而南韓民衆參與校友會的比例最高，高達47.78%。另一個臺灣獨特的現像是臺灣民衆參與政治團體組織的比例極度的低，僅有1.69%；中國、日本和南韓民衆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分別為8.12%，4.47%，5.52%。臺灣民衆似乎對於透過參與政治團體，來進行有組織地監督政府的機制相當地不熱衷，這是否也暗示了臺灣政黨政治失靈的訊號。

表 1 民眾社團參與比例 (%)：東亞四國

參加團體類型	臺灣	日本	南韓	中國
政治團體	1.69	4.47	5.52	8.12
社區（村里）管理委員會	4.27	60.72	26.43	4.58
社會服務團體（志工 / 非營利組織）	7.32	7.63	16.48	3.53
公民運動 / 消費者合作團體	0.84	15.98	6.66	1.74
宗教團體	12.10	10.30	29.23	2.70
校友會	3.94	44.80	47.78	6.41
康樂性社團（嗜好，運動）	11.20	30.92	38.75	4.84
工會	5.53	10.88	6.95	8.75
職業 / 專業協會 / 工商會	6.90	8.77	11.89	2.59
有參與社團的%	36.65	82.85	76.07	22.49
整體樣本數	2000	2203	1336	5688

表2是針對民眾過去一年最常參加的社團組織層級化的程度進行探討。東亞社會資本調查出題目的過程中，來自東亞四國的代表都認為東亞的組織文化中仍然充斥了上下層級的威權結構特質。民眾過去一年最常參加的社團組織是「上下權力關係分得清楚」的比例四個國家最高的是中國，高達29.71%，其次是臺灣13.19%，最低的是南韓7.12%。民眾最常參加的社團組織「有上位和下位之分，但大家輪流擔任」的比例最高的國家是日本，高達20.03%，最低的是中國，僅有3.65%。整體而言，民眾最常參加的社團組織強調成員間平等關係的比例仍然是超過50%，從民眾對於過去一年最常參加的社團組織層級化的主觀認知看出來，四個國家的民眾主觀認知成員間大致平等和完全平等的比例分別是，南韓77.87%，臺灣77.08%，日本69.78%，中國66.64%。南韓與臺灣民眾過去一年最常參加的組織，主觀認知成員間完全平等的比例相對是高的，分別是47.01%和41.76%。可見，日本的民眾不但是參與至少一個社團的比例是東亞三國（臺灣、南韓與日本）最高的；同時，民眾最常參與的社團組織層級化相對較臺灣和南韓為高。

表 2 民眾過去一年最常參加的社團組織層級化程度 (%)：東亞四國

	臺灣	日本	南韓	中國
上下的權力關係分得很清楚	13.19	10.19	7.12	29.71
有上位者和下位者之分，但大家輪流擔任	9.73	20.03	15	3.65
成員大致平等，沒有清楚的上下權力關係	35.32	33.26	30.86	37.61
成員之間完全平等	41.76	36.52	47.01	29.03
總樣本數	650	1,436	1,053	1,333

三、臺灣失靈的政府和高支持力的社會

表3呈現東亞四國對於政府和社區鄰里的看法，從這個表看出臺灣民眾對政府和政治的疏離，及對鄰里社區呈現高度的關心和支持的特質。臺灣民眾社團參與的下降，某種程度也反應在民眾對政府的無力感和對政治的失去興趣和疏離。相較於東亞其他三個社會，臺灣高達六成的民眾非常同意和同意他們對政府的作為是沒有影響力的，且認為政府和政治運作太複雜，他們也沒有能力理解。日本民眾顯然對政府比較有信心，不覺得自己對政府作為沒有影響力，也比較不同意政府和政治運作的複雜，有可能是日本民眾的公民組織參與活絡，故能較有組織地監控政府，讓政府資訊透明化，民眾對政治運作不致覺得太複雜。雖然，民眾對政治有興趣的比例普遍不高，但臺灣民眾對政治有興趣的比例是四個東亞國家最低的，非常同意和同意對政治有興趣的民眾僅有7.05%。

反觀臺灣民眾對社區和鄰里的看法，又可觀察到臺灣強大的社區關懷與支持的社會力。臺灣有八成的民眾（同意和非同意）希望能夠對臺灣社會有所貢獻，相對日本與南韓，希望對社會有所貢獻的民眾都在三成以下。同樣地，大多數的中國（75.85%）和臺灣（71.68%）民

眾，非常同意和同意村里鄰居都會互相關心；而日本（22.46%）和南韓（32.45%）非常同意和同意村里鄰居都會互相關心的比例相對較低。同樣地，臺灣民衆雖然認為無法影響政府，但卻對鄰里社區的主觀認知是有近七成的民衆覺得鄰里會互相關心和支持。相同的模式也發生在民衆對村里鄰居在需要時提供的幫助的看法上，臺灣（72.86%）和中國（69.10%）民衆有相當高的比例非常同意和同意村里鄰居在您需要的時候會提供幫忙；同樣地，南韓（33.52%）與日本（17.65%）民衆有相對低的比例非常同意和同意村里鄰居在您需要的時候會提供幫忙。顯然，日本與南韓民衆高比例的社團參與，公民對於公共的事務透過各類型的社團組織，解決公民議題；相對地，比較不需仰賴地方社會的動員與支持。在中國與臺灣社會的低度社團組織參與，高度社會與社區關懷的支持力量，都是值得更進一步探討的現象。

表 3 民衆對政府和社區鄰里的看法：東亞四國

	臺灣		日本		南韓		中國	
	非常同意 %	同意 %	非常同意 %	同意 %	非常同意 %	同意 %	非常同意 %	同意 %
對政府的作為是沒有影響力	26.11	37.39	11.05	17.25	24.50	24.64	13.41	38.15
政府與政治的運作太複雜	23.74	41.03	9.09	18.05	21.56	22.85	11.33	38.43
對政治方面有興趣	1.82	5.23	6.08	16.84	6.45	10.24	4.43	17.72
希望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	28.07	52.06	5.92	19.91	10.46	16.76	13.59	39.90
村里鄰居都會互相關心	17.72	53.96	4.02	18.44	10.89	21.56	26.97	48.88
村里鄰居在您需要的時候會提供幫忙	17.06	55.80	3.01	14.64	12.75	20.77	22.80	46.30

在Putnam（2000）的觀點中主張健康的市民社會，應該會出現人們高度參與社團，在社團中可產生相互來往的關係網絡（reciprocity）進而彼此產生信任規範。但在他的理論中，很少具體地定義信任，大多數遵循他的理論觀點的學者，都是比較強調民衆對陌生人的一般信任關係，比較沒有涉及民衆對社會從個人往外推的關係距離遠近的差序信任，及對組織化社會不同制度代理人的信任差異。

表4呈現東亞四地民衆對於十六種從人際關係的遠近親疏到對不同類型組織代理人的制度信任。東亞四國在非常信任和信任親戚和朋友的比例都是高達九成以上，但臺灣和中國的民衆非常信任與信任鄰居和同事的比例是較日本和南韓為高。顯然，不同社會的人們在最核心的關係上，都是具有最高度的信任；臺灣和中國具有較高度的社區鄰里的關心與支持主觀認知，故也呈現比較高度的鄰居信任。然而，臺灣和中國大陸非常信任和信任陌生人的比例明顯地較日本與南韓低；依照Putnam（2000）觀點，民衆較少透過社團組織和其他社會成員建立弱聯繫，進而也不易產生對陌生人的信任。臺灣民衆在非常信任和信任醫師、銀行行員、及公司主管上的比例也是四地相對高的，而臺灣最有趣的現象是民衆同意信任新聞記者的比例是東亞四地最低的。中國民衆非常同意信任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制度代理人的比例是東亞四地最高的。臺灣和中國的民衆非常同意信任老師的比例也是比日本和南韓高得多。和表2民衆對政府的看法一致，若民衆對政府失望感覺無力影響政府作為，會普遍地不信任各類政府制度代理人；臺灣民衆對於地方政府官員、中央政府官員、警官、軍官和法官非常信任與信任的比例都是東亞四地最低的。

雖然，我們可大略看出臺灣民衆對於政府失望和無力影響政府的看法很強烈，故反應在民衆對政府各類型代理人的制度信任程度普遍偏

表 4 民眾對十六種對象的信任程度：東亞四國

	臺灣		日本		南韓		中國	
	非常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同意
	%	%	%	%	%	%	%	%
有多信任親戚	31.09	59.90	40.81	50.26	35.96	52.36	51.69	45.43
有多信任朋友	16.88	72.25	29.55	62.71	36.82	55.95	27.22	65.04
有多信任鄰居	5.56	70.94	5.16	58.56	16.33	54.51	19.14	67.18
有多信任同事	7.47	72.96	10.25	61.38	15.33	54.87	0.40	6.54
有多信任陌生人	0.14	6.23	0.49	13.14	1.15	9.31	0.40	6.54
有多信任醫師	15.55	72.19	16.09	70.87	15.69	59.96	18.84	63.68
有多信任銀行行員	5.93	70.58	5.23	59.20	11.96	60.46	13.02	67.56
有多信任公司主管	6.32	65.63	1.98	40.00	4.44	46.85	4.71	48.56
有多信任新聞記者	0.38	21.54	0.67	27.70	4.51	37.54	9.86	53.19
有多信任非政府 / 非營利組織領導人	2.92	45.53	0.60	21.21	3.72	34.67	6.63	51
有多信任老師	12.31	75.92	4.45	59.50	18.05	59.10	29.94	61.75
有多信任地方 政府官員	2.03	38.35	2.05	48.77	7.52	45.20	9.49	48
有多信任中央 政府官員	1.25	32.27	1.79	44.18	5.23	40.90	25.7	53.33
有多信任警官	2.14	52.12	8.18	61.17	13.68	52.51	17.65	61
有多信任軍官	2.41	54.13	12.13	63.87	15.40	49.43	18.53	63.11
有多信任法官	3.07	46.77	10.38	65.23	13.68	50.14	16.3	62.4
一般信任*	4.93	36.81	4.31	51.24	3.72	37.11	14.99	68.72

低。但臺灣民眾對社區鄰居的情感連帶卻相對較強，臺灣的社會參與傾向於透過日常生活的社會網絡來動員社會力；故，Marsh（2003）主張臺灣民眾的公民參與和信任可能呈現的方式與西方既存的社團組織參與的信任規範不盡符合，建議觀察臺灣民眾透過非正式和社區的人際關係網絡與社會資本來理解臺灣的社會力。

四、臺灣民衆社會資本異質且豐富

個人社會資本是採用林南所設計的定位法的社會網絡蒐集方法（Lin and Dumin 1986; Lin, Fu and Hsung 2001）。定位法的個人觸及的社會網絡題組在臺灣社會變遷五期三次的題組上，都使用了22種職業位置來套出民衆的日常生活觸及的職業位置的網絡資源。後續林南又經過嚴謹的方法測試，做出十題能代表22種職業位置網絡資源的題項，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便採用這十題定位法社會資本測量題組。定位法的位置網絡設計企圖套出一般民衆可觸及的各行各業的社會位置資源，故這十個職業位置是代表了一個社會職業位置分布的金字塔的樣本分布，大學教授和律師代表兩個高職業聲望的職業位置，職業聲望分數分別為78和73。中間層的職業位置資源從人事主管的聲望60分到電腦程式設計師51分；下層的職業位置資源從警察的聲望40分到美髮師的32分。

表5列出四國民衆觸及位置網絡的模式，很明顯地，臺灣民衆觸及的社會網絡資源較多元，且觸及社會網絡的高、中、低階層十種職業位置的比例，有六種職業位置的觸及比例是四個國家最高的：大學教授、律師、人事主管、電腦程式設計師、警察和美髮師。此外，臺灣在四個國家民衆平均觸及的社會網絡職業位置數目是最高的，達4.15，而日本民衆平均觸及的社會網絡職業位置數目是最低的，僅2.60（表5）。中國和南韓民衆觸及網絡的數目則居於日本和臺灣之間。

在臺灣和國際的社會調查中，僅有少數的問卷將位置網絡資源的題組放入，另外一個經常出現在多次問卷調查中，且能夠呈現接觸社會網絡的數量的指標則是詢問民衆在日常生活中平均每天接觸的親屬和非親屬人數。定位法的位置網絡觸及的職業數目，除了代表民衆觸及的社會網絡數量，也代表了觸及社會網絡的高、中、低社會階層的社會資源

表 5 民眾認識接觸不同職業聲望位置的比例 (%)：東亞四國

	臺灣	日本	南韓	中國
大學教授 (78)	34.46	15.64	28.87	21.62
律師 (73)	19.92	11.21	17.19	13.97
護士 (54)	46.66	48.9	43.41	35.66
電腦程式 (51)	40.14	21.49	25.29	17.68
設計師 (51)				
中學老師 (60)	43.78	25.52	31.09	46.66
人事主管 (60)	47.06	18.69	19.56	19.66
農民 (38)	55.07	45.76	59.53	83.88
美髮師 (32)	54.88	42.2	39.76	27.69
櫃臺接待 (38)	33.33	16.98	9.67	14.55
警察 (40)	41.53	22.42	34.10	28.46
觸及職業數	4.16 (2.84)	2.60 (2.24)	3.08 (2.28)	3.10 (2.35)
總樣本數	2092	2192	1396	5758

(職業地位) 分布。在過去的研究中 (Lin, Fu and Hsung 2001) 也發現位置網絡的非親屬比例高，才會觸及較多元的位置網絡資源。日常生活接觸指標和定位法的位置網絡資源的差別，在於日常生活每天接觸人數無法呈現接觸網絡資源分布的模式，這次東亞社會資本調查比較特殊的部分是又繼續追問受訪者，請受訪者針對認知的平均一天所有接觸人數，在社會地位分布上進行主觀估計。多了這一題是可以和位置網絡的社會資源對照或互補。同樣地，臺灣在東亞四地的日常生活接觸非親屬人數上是最高的，仍然呈現和位置網絡接觸的職業數相當一致的發現。

問卷詢問受訪者平常一天裡面，除了家人和親戚以外，不論透過什麼方式，大概總共會跟幾位沒有親戚關係的人接觸？每天接觸人數的答項是使用範圍 (range) 的順序尺度來測量，選項如下：(01) 0人、(02) 1-2人、(03) 3-4人、(04) 5-9人、(05) 10-19人、(06) 20-49人、(07) 50-99人、(08) 100人或以上。

臺灣民眾的平均每天接觸非親屬人數是最高，達4.3，大約平均每天接觸10-19人 (表6)；而中國大陸民眾平均每天接觸非親屬的人數是最

低的，達2.84，大約3-4人。若更進一步地觀察他們接觸非親屬人數的地位分布，臺灣民衆每天接觸的非親屬的地位分布範圍很大，可說是三教九流多元異質，和表5呈現的位置網絡的異質多元是一致的。相對於其他東亞社會，臺灣民衆接觸的非親屬人數中，高地位多於低地位及低地位多於高地位的比例都是東亞四地最高的，在高地位多於低地位的比例和日本相當，達13.55%；在低地位多於高地位的比例是明顯地超過其他三地。換言之，臺灣民衆接觸非親屬的社會地位分布範圍（range）是較廣的，代表這樣的接觸網絡社會資本是比其他三地的接觸非親屬網絡的異質性來得更高。

表 6 民眾接觸非親屬的人數及地位分布：東亞四國

	臺灣	日本	南韓	中國
非親屬接觸平均值	4.31	3.94	3.16	2.84
（標準差）	1.77	1.73	1.39	1.54
高地位多於低地位	13.55%	13.38%	10.39%	9.23%
大部分地位差不多	79.38%	81.31%	83.81%	89.23%
低地位多於高地位	7.07%	5.31%	5.80%	1.55%
總樣本數	1867	2279	1396	5625

五、朝向東亞社會資本與信任理論的反思

從2000年以來，全球化在東亞四國的經濟和學術交流更加的頻繁，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也分別於2001年加入國際社會調查；也於2003年起參與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 Social Survey），成員包括臺灣、韓國、日本與中國等四個國家。前面針對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國家作比較性的描述分析，已可觀察到臺灣社會結構的獨特性，例如：臺灣社會民衆社團參與的公民組織能力特別弱，但日常生活每天接觸的社會資源量多又異

質性的個人社會資本特別豐富；民衆對政府認知感受特別地覺得無力影響政府的作為，故對政治沒興趣，也對政府各類制度代理人信任度特別低。從這次東亞社會資本的調查比較描述性分析中，所勾勒出來的圖像來看，若從經濟發展的組織化、理性和和制度化的理論軸線來分析，臺灣和日本是這個軸線的兩端，臺灣傾向於個人的人際網絡社會資本豐富，而日本傾向於公民組織的制度化程度較強。

在2012年的臺灣社會學年會中邀請了日本與南韓的社會學會理事長來參加臺灣社會學年會，當時的圓桌論壇主題便是討論東亞社會學為何？同樣地，國際社會學會的學術編輯部，也將於2014年橫濱會議，推出國際不同區域的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專書，目前拉丁美洲的社會學家的區域社會學主題很清楚，強調依賴發展和社會運動的區域社會學特性；但目前東亞社會學的部分，比較欠缺可以解釋東亞社會學歷史發展的特性。即使2012年，臺灣社會學會邀請了南韓和日本社會學會理事長來討論建立東亞社會學的可能性，但仍然也沒有太多具體的學術共識。

然而，政治學家很早就啟動了東亞民主化的社會調查（Asian Barometer），對於東亞民主化與公民參與相關理論的討論也較多，也提出東亞文化價值對信任、民主信仰和政治效能的影響的主張（Ikeda 2013; Chang, Chu and Park 2007）。臺灣的社會學家從東亞民主化的文化與公民社會的角度來探討東亞社會學理論相對是較缺乏的。一群研究東亞民主化或政治社會化的學者，發現東亞國家的民主化展現的模式是一種民衆對政府產生普遍地制度不信任後，在選舉投票上採取集體行動，政治學家認為南韓與臺灣的市民政治參與有這樣的特徵。特別是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中，相當缺乏Putnam（2000）主張的公民組織參與、信任規範及政府效能互影響的民主化發展的正面循環因果關係的機制。此外，這些研究東亞民主化的學者也比較忽略社會資本在制度信任上所

產生的效用，原因可能是民衆對政治效能的失望，故也不對制度代理者的角色寄予期望。這群學者跟據Asian Barometer東亞民主化社會調查資料來探討亞洲的民主化和民衆政治參與的關係時，都發現亞洲文化價值對民主化的影響。他們發現東亞社會結構文化的家父長和和諧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對民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及一般信任都具有正面效應。民衆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和一般信任具有負面效應，但傳統社會價值則具有正面效應（Ikeda 2013）。整體而言，這些政治學者在進行東亞民主化比較研究時，傾向於直接使用政治文化及治理系統論的觀點來分析社會信任與政府效能，這樣的觀點過度文化化約論。忽略了民衆藉著個人網絡資本或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產生的中間層次結構（meso-level）對公民參與和信任的影響。

社會學家將日常生活中建構累積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放入宏觀的國家社會脈絡下，日常生活中所累積的個人、社區和公民組織網絡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往往是民衆在因應人們的政治行動和經濟行動的重要調節機制。從前述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結果，可以簡單勾勒出一個公民組織參與、政府治理、社會信任與個人接觸的社會資本之間存在的一些可能相互影響的因果關係。以下，僅將個人日常生活接觸網絡資本和社團參與的組織資本對不同類型的信任影響模式，進行歸類，提出東亞社會學在社會資本與信任的機制上，可能產生的理論路徑。

社會資本與信任：東亞社會學的理论可能路徑

相對於政治學家，社會學家（Cook 2005）在以上複雜的因果關係路徑中，對社會資本與信任的關係上在經驗研究上是琢磨較深的。這些社會學家的理論和經驗研究驗證，仍然是放在公民參與的組織社會資

本與信任或市民參與之間的關係。Paxton（1999）定義信任是對人際間關係的主觀看法。基本上他對信任的定義仍然是從Putnam（1995）和Coleman（1988）的理論演繹出來的，將信任視為對廣泛他人人際來往的回報性（generalized reciprocity）的一般信任的主觀認知和內化的信任規範觀。Paxton（1999）主張一般信任規範的形成要仰賴民衆積極地參與社團，且在社團中與其他成員形成互相來往的高密度網絡，進而形成像Coleman（1988）社會資本論提及的交換的義務感和信任規範。一般信任的測量是詢問民衆對社會一般人可信任程度的評價。Paxton（1999）認為社會資本包括兩個成分：社團參與和一般信任，她的研究只是企圖操作社會資本的兩個成分，及驗證時間的長期趨勢如何影響社團參與數目與一般信任的變異。社團參與的社會資本與一般信任是互相影響的，一個人一般信任越強，越願意參與社團，參與社團越多，對不同團體和不同的人的彼此理解和連結能力越強，也趨向於一般信任越強。人們對廣泛大眾的信任程度，這其中當然包括陌生人和弱聯繫的社團成員。

大部分的西方文獻多從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來探討其與信任和市民參與的關係。Marsh（2003）在從事臺灣社團參與下降和民主化增長的矛盾現象時，便指出臺灣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化的關係，很可能是從日常生活的接觸和關係所形成的社會資本，作為市民參與和信任的基礎。Son and Lin（2008）同時關懷了個人接觸的社會資本和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民衆工具性和情感性市民參與的影響，但在這篇論文中，忽略了社會信任的概念。他們兩位使用2000 Social Capital Benchmark Survey來分析個人接觸朋友的社會資本與參與社團的組織社會資本對工具性和情感性市民參與行動的關連。

Son and Lin (2008) 的論文最大的特色是針對民衆社團參與進行組織社會資本的概念操作化。民衆透過社團參與的弱連結關係結識各種人口社會特質的社團成員，這種在社團參與中可能觸及的異質化的人口群，被社會學家視為組織社會資本。Son and Lin (2008) 使用民衆參與社團成員的性別、年齡、族群、教育程度和家戶所得的資料，發展了組織社會資本的概念和操作方法。組織社會資本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概念強調民衆參與社團可以生產的極大化異質性和極大化資源；包括了三個成分：組織異質性 (organizational diversity)、組織異質性的範圍 (range of 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和組織資源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組織異質性是測量民衆參與社團可以觸及五種特質的極大化異質性；組織異質性的範圍是民衆參與社團可以觸及最大和最小異質性的差距範圍；組織資源則是民衆參與社團可以觸及極大教育和家戶所得資源。

東亞社會資本調查在個人社會資本的問題設計上主要是根據定位法的位置網絡，比Son and Lin (2008) 操作個人社會資本的題目設計更恰當。Son and Lin (2008) 的個人社會資本問題設計和答項如後：請你現在回想你有沒有私人的朋友（未必是最親近的）他是以下特質：老闆、無技術工人、依靠福利為生，白人、西班牙人、同性戀、社區領袖。這個接觸網絡的個人社會資本比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個人位置網絡的測量粗糙許多，階級、族群及社會團體的代表類屬都很簡單，加總後很難區分是階級、族群或社會團體的多元性。

李俊 (2011) 使用林南主持的2004和2007年的兩波社會資本調查資料，進行前後兩年的個人社會資本與組織社會資本對信任的因果關係探討，結果發現參與社團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社會一般信任的建立沒有顯著影響；反而，是透過個人觸及的社會網絡的多元性 (Lin and Dumin

1986），才是產生一般信任的影響因素。依照日本東京大學學者Ikeda and Kobayashi（2009）的發現，個人觸及的社會網絡多元異質，有助於對於不同社會位置或不同政黨或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包容性，故有助於一般信任的形成。Ikeda（2013）發現民衆個人信任高和支持網絡的規模大，則一般信任也較高，但這個研究並未同時考量Putnam（2000）的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和民衆接觸網絡的個人社會網絡資本對各類型信任的影響。

表7企圖將社會資本與信任關係的統計分析結果進行摘要比較，希望能夠藉者比較四國在個人社會資本與組織社會資本對三種類型的信任的影響力模式上，來呈現東亞社會資本和信任的調查中，可能提出的東亞社會學理論解釋的方向可能性。這三種類型的信任命名為：人際信任、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則是由表4民衆對於16種對象的信任程度，進行因素分析取得的人際信任（對親戚、朋友、鄰居、同事等對象的信任）和制度信任（對地方政府官員、中央政府官員、警官、軍官、法官等對象的信任）兩大因素組合分數。一般信任是

表 7 個人和組織社會資本對於人際信任、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影響：東亞四國比較

	臺灣		中國		日本		南韓	
	個人社會資本	組織社會資本	個人社會資本	組織社會資本	個人社會資本	組織社會資本	個人社會資本	組織社會資本
人際信任	+	n.s.	-	n.s.	+		+	+
制度信任	n.s.	n.s.	n.s.	n.s.	n.s.	+	n.s.	n.s.
一般信任	+	n.s.	n.s.	+	+	+	+	n.s.

註：日本的16題信任僅落在一個因素下，這個因素的負荷值又以制度信任題目為高，故命名制度信任。

- 負效應， $p < .05$

+ 正效應， $p < .05$

由一題來測量：一般說來，請問您認為大部分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嗎？答項包括（1）人幾乎都是可以信任，（2）人通常是可以信任，（3）與人來往通常要小心，（4）與人來往幾乎都要很小心。表7的個人社會資本是將個人觸及的位置網絡的廣泛性（*extensity*），觸及網絡最高職位，及觸及網絡最高和最低職位的差距範圍（*range*）所組合而成的因素分數（Lin, Fu and Hsung 2001）。

表7是從附錄詳細的迴歸模型複雜係數整理出易讀的摘要表，表7僅顯示在迴歸模型中東亞四國的個人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對於三種類型信任的影響力，表中僅用顯著（呈現影響力方向）與不顯著（*n.s*）來標示。臺灣、南韓和中國大陸的民衆個人觸及的社會網絡資本對於人際信任具有顯著影響力；臺灣與南韓民衆的個人社會資本越異質化，則人際信任越強。反之，中國民衆個人社會資本越異質化，則民衆的人際信任程度越低；這樣的研究發現和Völker（2001）對東德的研究發現很類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東德，民衆仍然對弱聯繫關係不信任，故觸及社會網絡的異質性大，對信任有負面效用。日本民衆的16種信任對象僅落在一個制度信任的因素上，故不存在民衆的個人社會資本因素。四個國家的民衆個人社會資本的異質性對於制度信任都沒有顯著的影響。最有意義的發現是臺灣、南韓與日本的民衆個人社會資本對於一般信任都有正面的影響力，但這樣的影響機制，對中國民衆是不顯著的。Ikeda（2013）使用11個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資料，發現個人的支持網絡規模對於一般信任也是有正向效果。Putnam（2000）的理論中是忽略了民衆個人網絡產生的一般信任效果，個人網絡的異質性產生了一般信任效果，究竟是東亞三國獨特的現象，或是一個全球普及的原理，是需要進一步求證。

整體而言，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制度信任、人際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影響力都不如西方理論期待的效應。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臺灣、南韓與中國民衆對政府官員的制度信任都不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僅有日本民衆高組織社會資本的群組相對於無參與社團的零組織社會資本群組民衆，其對政府官員等的制度信任顯著地高。民衆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人際信任的正面影響僅發生在南韓，其他國家則都不顯著。這個關係也意味著其他國家民衆對於人際信任的影響，可能來自於人們參與社團中產生了個人異質化的社會網絡，進而影響了個人對具體熟識的對象產生的信任。僅有日本與中國的高度的社團參與的民衆具有顯著的高一般信任現象。

六、結論

藉著從2012年的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初步比較分析，發現這個調查資料可以作為建立東亞社會學討論的一個可能平台。社團參與的公民社會力量，及從個人的人際信任到對政府的制度信任，一直都是東亞政治學家長期致力於東亞民主化理論解釋切入的角度。東亞政治學家發現民衆若有較高的儒家文化的家父長制、和諧關係等傳統價值觀，傾向於對政府的制度信任和對陌生人的一般信任程度都較高。在本次調查中民衆最常參與的社團組織成員層級威權結構的模式來看，中國和日本都呈現比臺灣和南韓高威權的社團組織成員權力位置結構模式。同樣地，本調查也發現民衆一般信任的分數高低順序也是中國、日本、臺灣和南韓。這些初步呈現的模式是和Ikeda（2013）使用Asian Barometer的調查發現很類似。權威層級的公民組織的治理結構對於一般信任的影響，也可以從本論文最後的迴歸分析摘要表看出來，中國和日本高組織社會資本的

民衆都傾向於有較高的一般信任。中國大陸的層級權威結構的歷史文化建構過程和日本是不同的，民衆對於威權結構的正當性認可的文化意義也是不同的，前者是在共產黨主控的威權國家，後者是日本百年來的現代化及封建化的組織制度化特質，故一般信任的正當性來源，更進一步地理論化組織社會資本與一般信任的意涵是必要的。

東亞社會資本調查是首次對臺灣、日本、南韓與中國四地蒐集完整的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個人接觸的位置網絡資本、及人際信任、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的資料。Asian Barometer的調查缺乏民衆社團參與的資料，故研究東亞民主化的政治學家很少關懷Putnam（2000）強調的民衆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對於信任規範建立的因果機制，政治學家更少注意到臺灣民衆低度的公民組織參與。Marsh（2003）雖然很早就使用臺灣社會變遷調查1992和1997年的資料，注意到臺灣民衆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但他仍然沒有釐清社團參與和信任之間的關係。但很可貴的是在他2003年的論文中，他已提及臺灣民衆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公民參與，可能有其獨特模式，他認為臺灣民衆可能是透過社會的關係社會網絡（guanxi social networks）的機制，但長久以來各類調查都缺乏同時設計個人接觸網絡的資本及社團參與的組織社會資本題項。

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同時設計了四國民衆的個人和組織社會資本題組，經過初步分析後，認為採用個人社會資本和組織社會資本的概念機制，可以揭露屬於現代化和工業化過程中，臺灣和中國大陸的以人爲主的社會網絡資本運作機制仍然很強。日本的公民組織的組織化和制度化程度最強，個人社會網絡運作機制薄弱，南韓則臺灣和日本之間。東亞三地在公民社會發展的比較上，臺灣和日本像是公民組織文化的兩個極端，臺灣的公民組織最弱，很可能是因爲臺灣的公民組織就和臺灣的企業組織發展一樣，也是呈現規模不大的組織特質（官有垣、杜承

嶸、王仕圖 2010)。東亞政治學家在討論東亞民主化的現像時，帶入了東亞四地共同分享的文化結構特質：儒家文化結構的威權層級結構；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在進行日本、南韓和臺灣經濟組織的結構特質時，也將東亞文化的家父長威權結構的特性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分析的共同主軸。從2012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資料的初步分析上，在民主化和現代化過程中，臺灣、南韓與日本的公民社會形成過程中，個人接觸網絡和社團組織參與的個人與組織社會資本的運用，及對各類型社會信任和市民參與的影響機制的相同與不同的路徑，都是未來東亞社會學家企圖建立東亞社會學的切入點，及可以發展東亞社會學的對話和研究的平台。

作者簡介

熊瑞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過去十年的主要研究重點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使用大型調查資料，進行有關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研究的相關議題研究；另一個部分是臺灣高科技產業勞力市場的制度分析與專利發明人的創新網絡研究。

附錄 個人社會資本和組織社會資本對信任的影響： 中國、日本、南韓、臺灣

	臺灣			日本	
	(1) 制度信任	(2) 人際信任	(3) 一般信任	(1) 制度信任	(2) 一般信任
個人社會資本	0.02 (0.69)	0.12 ^{***} (4.69)	0.09 ^{***} (4.57)	0.00 (0.03)	0.06 ^{***} (3.61)
低組織社會資本	-0.01 (-0.13)	0.08 (1.57)	0.05 (1.28)	0.03 (0.45)	0.07 (1.64)
高組織社會資本	0.13 (1.62)	0.10 (1.42)	0.09 (1.69)	0.12 [*] (2.55)	0.09 ^{**} (2.68)
性別	0.16 ^{***} (3.48)	-0.06 (-1.47)	-0.02 (-0.63)	0.18 ^{***} (4.28)	0.04 (1.43)
年齡	-0.03 ^{***} (-3.96)	0.00 (0.29)	-0.00 (-0.08)	-0.02 [*] (-2.30)	-0.00 (-0.03)
年齡平方	0.00 ^{***} (3.63)	-0.00 (-0.21)	0.00 (0.14)	0.00 ^{**} (3.03)	0.00 (0.12)
教育年數	0.01 (1.25)	0.03 ^{***} (4.30)	0.04 ^{***} (7.25)	0.03 ^{**} (3.06)	0.04 ^{***} (5.31)
截距	0.45 [*] (2.12)	-0.50 ^{**} (-2.60)	1.87 ^{***} (12.93)	-0.28 (-1.17)	1.98 ^{***} (12.30)
N	1431	1431	2108	1816	2266
R-sq	0.024	0.061	0.086	0.028	0.036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 ^{**} p<0.01 ^{***} p<0.001"

附錄 個人社會資本和組織社會資本對信任的影響： 中國、日本、南韓、臺灣（續）

	南韓			中國		
	(1) 制度信任	(2) 人際信任	(3) 一般信任	(1) 制度信任	(2) 人際信任	(3) 一般信任
個人社會資本	0.05 (1.87)	0.06** (2.60)	0.09*** (3.75)	-0.01 (-0.99)	-0.03* (-2.18)	-0.02 (-1.54)
低組織社會資本	-0.01 (-0.18)	0.21*** (3.82)	-0.02 (-0.46)	0.01 (0.23)	-0.04 (-1.17)	0.03 (1.04)
高組織社會資本	0.01 (0.16)	0.19*** (3.44)	-0.05 (-1.00)	0.06 (1.46)	0.04 (1.01)	0.06* (1.97)
性別	0.08 (1.78)	-0.10* (-2.34)	-0.06 (-1.37)	0.05 (1.82)	-0.04 (-1.80)	-0.01 (-0.52)
年齡	-0.02* (-2.52)	0.01* (2.14)	0.00 (0.38)	0.00* (2.27)	0.00** (2.62)	0.00*** (6.67)
年齡平方	0.00*** (4.01)	-0.00 (-1.75)	0.00 (0.09)	-0.00 (-1.57)	-0.00 (-0.34)	-0.00*** (-4.14)
教育年數	-0.01 (-1.25)	0.00 (0.09)	0.01* (2.22)	-0.03*** (-7.57)	-0.00 (-0.57)	0.00 (1.20)
截距	0.14 (0.71)	-0.47* (-2.53)	2.08*** (11.76)	0.08 (1.24)	-0.08 (-1.31)	2.74*** (64.65)
N	1391	1391	1391	5050	5050	5704
R-sq	0.078	0.036	0.021	0.026	0.007	0.01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 ** p<0.01 *** p<0.001"

參考書目

- 李俊，2011，〈社會資本與一般信任的動態因果關係〉。台北：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官有垣、杜承嶸、王仕圖，2010，〈勾勒台灣非營利部門的組織特色：一項全國調查研究的部分資料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7: 111-151。
- 潘美玲、張維安，2001，〈彈性生產與協力網絡：協力廠觀點的個案研究〉。《臺灣社會學刊》25: 201-242。
- 陳介玄，1994，〈協力生產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
-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2010，〈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臺灣社會學刊》44: 55-105。
- Cook, Karen, 2005, "Networks, Norms, and Trus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8(1): 4-14.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1.
- Chang, Yu-Tzung, Yun-Han Chu and Chong-Min Park, 2007, "Authoritarian Nostalgia in Asia." *Journal of Democracy* 18(3): 66-80.
- Hamilton, Gary and Nicole W. Biggart,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52-94.
- Ikeda, Ken'chi and Tetsuro Kobayashi, 2009, "Making Democracy Work Via the Functioning of Heterogeneous Personal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Japanese Election Study."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Breiger. London: Routledge.

Ikeda, Ken'ichi, 2013,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 East and Southeast."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9(1): 13-45.

Luhmann, Niklas, 2000, "Famili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 Pp. 94-107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ited by Gambetta, Diego.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Lin, Nan and Mary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4): 365-385.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Nan, Yang-chih Fu, and Ray-May Hsung, 2001. "The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Pp. 57-84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Marsh, Robert M., 2003, "Social Capital, Guanxi, and the Road to Democracy in Taiwan."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 575-604.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1): 88-127.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65-78.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on, Joonmo and Nan Lin, 2008,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Action: A Network-based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 330-349.
- Tocqueville, A. de.1961,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 Völker, Beate, 2001, "Weak Ties as A Liability. The Case of East German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3: 397-428.